

学习《讲话》精神 发扬优良传统

发表八十周年座谈会在太原举行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太原联合举办《“讲话”精神与赵树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学习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精神和中国作协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研讨会精神,结合山西文学的创作实际和文学传统,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文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繁荣。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

大家一致认为,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刻论述了文艺和人民群众、文艺和革命斗争、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今天我们重温《讲话》,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方向,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艺创作生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我们学习、理解、实践《讲话》精神,就是要把握其立场和方法,在创作中继承、弘扬传统,体现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树立使命意识,承担更多责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更好地鼓舞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与会者指出,山西的广大作家学习《讲话》,有着更深的体会。因为《讲话》发表以后,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赵树理、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一大批山西作家迅速成长,形成了中国文坛一个重要流派“山药蛋派”,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山西广大作家曾与他们战斗在一起,曾经聆听他们的教诲,他们的现实主义风格一直影响着山西广大作家的创作。人民作家赵树理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成长起来,他的文艺创作理念、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宝贵的文学财富。赵树理是一杆不朽的旗帜,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輩作家为人民创作,为人民书写,当代作家、当代山西作家应该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继续践行《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去发现、去书写。

肖静娴

《红色银行》研讨会暨红色主题中国故事出版论坛举办

5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作协创研部、安徽出版集团、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安徽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承办的原创长篇小说《红色银行》研讨会暨红色主题中国故事出版论坛举办。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太原、合肥三地同步召开。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代表中国作协充分肯定了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红色银行》的创作成果,他指出,在红色题材作品的巍巍大潮中,《红色银行》引人注目。

与会嘉宾充分研讨,一致肯定了《红色银行》的社会价值和文学意义,指出这是一部倾情红色主题、直面金融题材、承载文化厚度的独特珍贵的优秀原创长篇小说,是张卫平先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创获,是中国作家献礼建党百年、喜迎党的二十大的深情赞歌。安徽、山西两地同为革命老区,都积淀了红色文化,通过两地的深度互补,相信能够为繁荣发展红色文化、推动主题图书出版提供更多的动力,积累更多的经验。与会的文学工作者、出版工作者积极倡议,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推出更多书写时代、书写人民的精品力作。

原创红色主题长篇小说《红色银行》,入选2020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专项长篇小说)、2021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自2021年8月出版以来,受到业内及大众读者的广泛好评,入选“文艺联合书单”“文学好书榜”“影响力书单”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对《红色银行》给予重点关注推评;《长篇小说选刊》推出“山西作家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专辑”,予以全文转载;多家银行将其选为党史学习教材,集体团购、学习,并已列为党史学习常态化的必备读物;山西广播电视台将其改编为34集有声小说予以连播,并在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发布。

李 娟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红星杨》是我省作家蒋殊的首部儿童小说,书写的是烽火年代里成长的中国少年。书中讲述了少年杨留贝及伙伴们保卫红星杨的故事,见证了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作品中不仅有火热生动的乡村生活、生动活泼的童真童趣、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更有炽热坚定的革命情怀和义无反顾的爱国热情! 本版今日刊发蒋殊的创作谈和林小静的评论文章,作为少年儿童的节日礼物,祝少儿朋友儿童节快乐!

## 那棵树，那些少年

### ——《红星杨》创作谈

蒋 殊

书写《红星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过程中,一直觉得杨留贝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比我小很多年龄的阶段,看到“红星杨”,并与这些伟大而特别的树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边写,一边想,我初次听到“红星杨”,好像是少年时期?只记得当时一个影子飞到我身边大口喘气,“知道不?树里藏着‘红五星’,与红军帽子上一模一样的‘红五星’!”

我没见过红军帽,可我知道红军帽,也知道鲜红耀眼的五角星。可是,树里藏着红五星,那是电影里的故事吧?还是谁在恶作剧?及至长大一些后,终于知道,有一棵看上去很普通的杨树,树干里真的藏有神秘的“五角星”。这棵树被命名为“红星杨”,就生长在我的家乡武乡。

家乡养育了八路军,家乡还生长出“红星杨”?我一直以那片土地为荣。是当年贫穷的家乡人,用生命与气节捍卫了脚下的土地,让我可以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或许是缘于和平与安宁吧,我在得知有这样一棵“红星杨”后,并没有迫不及待去看望它,只任它的种种故事像风一样在耳边游走。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遇见。

“看呀,我们的红星杨!”咯嘣一声,两截细细的枝条截断在我面前。可是,这哪里是两截树枝呀,我看到的,是两枚清晰的五角星,那工整规范的形状,怎么可能是树里自然生出的?分明是一刀一刀刻进去的!

内心一阵震撼。手!到底是谁的手?大自然中一定有一股力量,以人类无法看到的方式,神秘地存在着!

看到红星杨的一刻,并非在武乡,而是在沁源,并非王家峪八路军总部,而是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那一天,是《沁源1942》首发日——2020年9月12日。

沁源与武乡同属长治市,两地相距75公里。尽管这样,那个瞬间还是有些恍惚,沁源怎么也有红星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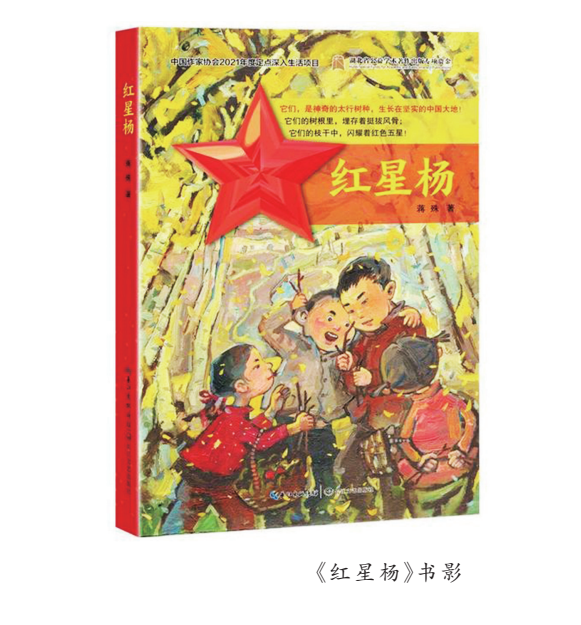
在疑惑中,脑中有了个较为模糊的框架,那就是以抗战为背景,以太行山中几位少年偶然发现并誓死保卫“红星杨”为故事主线。

红星杨,为什么值得保护?红星杨从哪里来?为何独独生长在太行山中的革命老区?“五角星”藏在普通杨树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寓意?山中少年有着怎样的愿望与坚守,要拼死保护红星杨?

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我,也诱惑着我在多年以后重新认识红星杨。以致于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一双神秘的手突然映现在星空下,那一定是当初那双手,种下那棵神秘的树。那双手,一定也是在这样一个皎洁的月光下,一根一根,将那些木头剖开;一颗一颗,在里面刻满五角星;又一枝一枝,拼成一棵树的形状。

只是,为何里面偏偏刻下的是五角星?为何它的颜色,又微微发红?种下的那棵树,在那片土地要担当什么样的重任?

求助红星杨,它却参天伫立,不言不语。可是,我相信它有话要说。很快,那个为了一碗饭而丢了一条命的曾祖父出来了,他的一碗饭,变成一棵树;那个曾被小脚娘一脚踢远,被迫跟着牛羊奔跑的少年出来了,他奔跑的前方,就是杨林沟;那个与伙伴斗鸡的“猴儿”出来了,他们搏斗的场所,就在红星杨下;还有那个穿



《红星杨》书影

着缀有蓝蝴蝶的红棉袄女孩,她抱着一条雪白的狗瑟瑟发抖,那雪白雪白的毛色上,沾满鲜血……这些一个一个跳出来的人,都是曾经与我对话的人,战火纷飞年代,他们都曾是少年。与他们交替出现的,还有曾经活跃在太行山中朱德儿童团、抗战儿童团的孩子们,他们苦难深重,却始终向光而行。

一段时间内,这群少年,以及一沟树,树上“喳喳”叫着的喜鹊,成为我脑中流动的风景。

进入2021年,书写过程一度很愉悦,直到3月底进入尾声那一刻,愉悦感也划了句号。

回头看,故事的发生与发展,似乎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这个时候,却收到一份沉甸甸的信任,《红星杨》入选2021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我知道,这是红星杨的力量。太行山中这一棵树,以及当年保卫树的那些少年,已经牵动了读者的心。我也知道,了解红星杨,了解那些少年,需要深入,再深入。

打开电脑,从头再来。语言、结构、情节、细节、走向、人物性格、故事流转……一切都没有原型,没有史实,我只跟着人物走,惊恐地看着大风任性地吹,欢喜地跟着少年们肆意跑,忧伤地看一台大戏孤独地唱,哭泣着看一场大火在杨林沟熊熊燃烧。半个月时间,我一口气完成了第三稿,也就是读者看到的这一稿。

我试着解读了一种树,创作出我的第一本青少年小说,也努力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感谢《沁源1942》,让我续缘红星杨。我的回馈,便是将书中第一主人公,起名“杨留贝”。他的原型,是沁源学孟村一个少年,本名李留贝。

初见他时,他举着一把羊铲从刚刚收割完玉米的土地飞奔过来,自豪地告诉我,他的村庄是英雄村。

远远地,那把羊铲像极了一支红缨枪。问他,如果战争来临,敢不敢去送信?

他只犹豫了一秒,便果断回答:“敢!”

分明,他就是从前那个少年,站在一棵红星杨下,眼里闪着光。

## 在童心中播撒红色种子

### ——《红星杨》的叙事风格

林小静



红星杨树枝

提起烽火少年,人们自然会想到小兵张嘎、放羊娃王二小,还有送鸡毛信的海娃等,他们脍炙人口的故事,曾留在几代人的心中。

近日,读蒋殊新作《红星杨》,被深深吸引。随着书中故事情节的的发展,让人仿佛又看到了嘎子、王二小和海娃的身影。

红星杨是一种奇特的树,我曾在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的院内看到过这种树。轻轻掰开树枝,可以清楚地看到,树枝的断面,是纹理清晰、端端正正的红五星图案。这让我对院中的那颗红星杨充满敬畏。再之后,听朋友介绍,武乡也生长有这样的树。

在武乡八路军总司令部,生长着一棵红星杨。相传当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朱德总司令将一直珍藏在身上的一枚红五星帽徽,埋在了树根下,从此,武乡有了红星杨。虽然只是传说,但却表达了当地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们所带领的军队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那场战争虽已远去,但他们身上不屈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蒋殊的《红星杨》,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

深刻的道理,不一定要用宏大的叙述或深奥的语言来呈现,相反,优秀的作家,总会以扎实的功底、朴素的文风、平实的语言,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读者

1987年春天,马烽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曾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的形象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别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决不改变。总结马烽60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让农民读者喜欢,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的作品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的态度是:“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即使你的作品内容再好,艺术性再高,农民群众不接受,也就失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马烽是要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他把自己的读者受众定位于农民,不仅是因为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还因为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马烽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早也最能体现马烽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他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他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1945年春天,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1945年6月5日,《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每周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刊登完,共95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风味,人物与情节经过马烽、西戎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

《吕梁英雄传》在报上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曾回忆说,《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期间,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鸡叫,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

这部作品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其原因正像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评介文章所概括的:“是因为它所写的晋绥人民杀敌保家的事情,都是当地老百姓熟悉的事情。”七七’以后,晋绥军仓皇溃退,吕梁山脉林林山康家寨沦入敌手,无辜人民遭敌烧杀、抢掠。一直到一二〇师东进,组织民兵,反掉‘维持’,实行劳武结合,战胜敌人的‘扫荡’和破坏,而创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晋绥人民都是亲身参加,亲身体验过的,他们不仅从书里看到自己走过了怎样艰苦、崎岖、危险的道路,经历了如何惊心动魄的残酷复杂的斗争,而且从书里认识了自己,肯定了自己,也教育了自己。”

1946年,马烽、西戎整理了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为了让大后方的人们了解根据地的八年抗战经历,了解敌后人民群众同侵略者以及伪军的顽强斗争精神,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并由重庆大众书店翻印出版。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好评。

1949年初土改结束后,马烽、西戎集中了一段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后来,马烽和西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以后,隔几年印刷一次。

马烽在写作《吕梁英雄传》过程中体会到,让农民群众喜欢阅读,首先要从语言上做到通俗化、大众化。因此,在写完这部作品后不久,他曾写过一篇创作谈文章《漫谈学习群众语言》,其中一段话说:“学习群众语言,了解群众语言,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大众化文艺工作者起码的条件。学习群众语言的目的,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观点。

②

